

宋代文譚叢書



歐蘇手簡

校勘

夏漢寧
校勘



中山大學出版社

宋代文譚叢書

「歐蘇手簡」

夏漢寧
校勘

校勘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歐蘇手簡》校勘/夏漢寧校勘.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 7
(宋代文譚叢書/夏漢寧主編)

ISBN 978 - 7 - 306 - 04919 - 3

I. ①歐… II. ①夏… III. ①書信集—中國—宋代 IV. ①I264.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07876 號

出版人：徐 劲

策劃編輯：丁 儉

責任編輯：丁 儉

封面設計：林綿華

責任校對：陳中新

責任技編：何雅濤

出版發行：中山大學出版社

電 話：編輯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發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 編：510275 傳 真：020 - 84036565

網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zdch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廣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787mm × 1092mm 1/16 40.5 印張 770 千字

版次印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 ~ 1000 冊 定 價：109.00 元

如發現本書因印裝質量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校勘者簡介



夏漢寧，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現任文學所所長、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宋代文學重點學科帶頭人、江西省中國宋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文藝學會常務副會長、江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一代文宗歐陽修》、《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合作）、《賈誼文賦全譯》、《曾鞏》、《新選新注唐宋八大家書系·曾鞏卷》（合作）、《閑雅小品集觀——唐宋元文人小品百家》（合作）、《歐陽先生文粹·歐陽先生遺粹校勘》、《宋代江西文學家考錄》（合作）、《宋代江西文學家地圖》（合作）等。

總序

夏漢寧

宋代文化向爲學界所關注。早在二十世紀初、中期，學術界就有不少前輩和大家將目光聚集在宋代文化上，如，陳寅恪先生就曾對宋代文化、宋代學術、宋代史學等給予高度的重視和評價。他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寺〉序》中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在《略論稿》中又說，「宋賢史學，今古罕匹」；在《贈蔣秉南序》中，除了推崇歐陽修「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之外，更對宋代文化給予了高度評價，「故天水一朝文化，竟爲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陳寅恪更是對宋代文化贊美有加，提出了一個至今爲人樂道的精辟觀點，「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同是在這篇文章中，陳寅恪還曾預言，中國學術文化「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論斷，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再如，嚴復在《與熊純如書》中寫道：「若研究人心政俗不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所造就，十（之）八九可斷言也。」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家》一文中也認爲：「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金毓黻在《宋遼金史》中說：「宋代膺古今最劇之變局，爲劃時代之一段。」「凡近代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幾乎無一不與之相緣，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遼金史，實爲治近代史之始基。」……前輩學者關於宋代文化的各種評論，都顯示了一個明確的指向——宋代文化值得關注、值得研究！

正是在前輩學者精神的導引下，宋代文化研究已成爲國內學術界非常活躍的前沿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不說別的，單說宋代文化的研究叢書，就出版了不少，其中影響較大的叢書是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研究叢書》。這套叢書不僅出版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而且還出版了「日本學者系列」，有學者稱，《宋代研究叢書》「爲中國宋史研究打響了鼓號，彈不虛發，都很解決問題，既可作爲引路之作，又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值得慶賀。深爲中國宋史研究取得

的成果而雀躍」（王瑞旺先生語）。還有一套影響較大的叢書，那就是由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杭州出版社等聯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叢書》。這套叢書已出版了五十多本，據說還將繼續編撰出版。對於這套叢書的出版，學界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套叢書規模不大，水平之高，在該領域都堪稱是一個創舉」（陳祖武先生語）。……類似的研究叢書還有很多，限於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評價了。

作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既突出地方特色，同時又具有全國性意義，我們便很自然地將目光投向了宋代。換言之，作為地方社會科學院從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學者，我們比較早地將視線聚焦在宋代文化研究上，並將研究重心確定在宋代文化和文學領域。對於這種選擇，事實證明是正確的。圍繞這個中心，多年來我們也開展了一些相關的學術活動，編撰了相關的學術著作。例如，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筆者就曾參與組織了各類與宋代文化有關的學術活動，像「紀念曾鞏逝世九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紀念黃庭堅誕生九百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二晏學術討論會」、「文天祥誕辰七百六十周年學術座談會」、「謝叠山誕辰七百七十周年學術座談會」、「文天祥學術座談會」、「宋代地域文學研討會」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筆者作為主編之一，還編撰出版了《宋代文化研究叢書》。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更是加大了對宋代文化研究的力度，將宋代文學研究列入了院重點發展學科，并在人員、資金等方面給予有力的保障。

為了展示近幾年在宋代文化和文學研究方面的成果，我們策劃了這套《宋代文譚叢書》。正如上文所說，當下關於宋代研究的叢書已有不少，如何凸顯自己的特色就成為這套叢書的關鍵。為此，我們頗費了一些心思，最後決定將這套叢書的基點定位在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獻校勘整理上。

之所以確立這個基點，主要是出於以下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宋代是江西文化十分繁榮的時期，而文學的繁榮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標志。僅以兩宋江西文學家為例，據我們對《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所收錄的文學家情況的統計：活躍在兩宋時期，并有作品傳世的文學家共有一萬六千八百一十三人，其中有籍可考的有一萬零二百六十二人；在已知籍貫的文學家中，江西籍文學家就有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七點八六，僅次於浙江、福建，居全國第三。在這一千三百二十二位文學家中，還有一個獨特之處，那就是家庭特色十分明顯。據初步統計：兩宋江西文學家庭就有一百零六

家，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另據統計：《四庫全書》收錄宋人別集近四百部，其中江西籍文學家別集有八十三部，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多；《兩宋名賢小集》共錄兩宋文學家一百五十七家，其中江西籍文學家錄四十一家，占總數約百分之二十七，而這四十一家還未包含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劉辰翁、文天祥等人。宋代江西文學異彩紛呈的局面，構成了兩宋文壇一道燦爛的風景線。第二，江西在兩宋時期是文壇關注的熱點地區之一。對出現於兩宋文壇的這種「江西現象」，宋人不僅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而且對這一現象的產生發表了熱情的贊揚以及理性的剖析。如，倪樸在《筠州投雷教授書》中這樣說：『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於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為天下倡，而后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斲喪萎荼之余習斬焉不存。而后陽公首以古學為天下倡，而后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為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啓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為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氣象。若夫南豐曾夫子以辭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究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余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數。江西蓋多士矣。』黃次山在《重刻臨川文集序》中稱：『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李道傳等在《謚文節公告儀》中，由楊萬里而論及宋代江西的文學家時也說：『國朝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衆者。』第三，在兩宋文化名人、文化大家中，有很多都是出自江西。僅舉兩個例子，即可略窺一斑：首先還是以文學家為例，在衆多的江西籍文學家中，有不少是兩宋文壇中的大家或文壇領袖，或開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姜夔等。這些文壇巨擘不僅支撐起兩宋江西文學的天空，而且還是聳立在宋代文學版圖中的一座座高峰。其次以科舉為例，據順治《江西通志》、民國時期《江西通志稿》等文獻資料統計，宋代江西共有進士五千五百四十五人，其中三十四人文武科鼎甲，十一人為狀元。科舉的輝煌為江西文化的繁榮奠定了人才基礎。例如，在一千三百二十二名文學家中，就有六百四十四名為進士；再如，在江西籍文化人中，有不少由科舉走出江西而進入當時統治集團的高層。兩宋時期，江西有十六位宰執，北宋六位，南宋十位。在這些宰輔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化大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適、周必大、江萬里、文天祥等，這些人進入統治集團高層後，為江西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機遇。

正是基於上述考慮，我們纔把叢書的基點確立在對宋代江西文化研究和宋代江西文獻校勘整理上。於是，在這套叢書

中，讀者便能發現，其中既有對宋代江西文化名人、江西文化現象的研究，又有對宋代江西文獻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如果說特色的話，這當是本套叢書的最大特色吧！

在叢書即將出版之際，我們還想借此機會表達真誠的謝意：感謝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對這套叢書的慷慨資助；感謝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汪玉奇先生、副院長毛智勇先生和葉青先生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感謝中山大學出版社為叢書的出版精心編校，并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總之，叢書的出版，除了作者的努力外，還與方方面面的關注、幫助密不可分，這正如常言所云『人人有惠於我』。

由於水平所限，叢書中必然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錯誤，我們期待方家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南昌青山湖畔

重刻歐蘇手簡序

〔1〕

人情之於交際，無古今焉，無東西焉，唯其所以言之不同爾。操觚之士以其情之所同，欲同其言之不同也，片簡短札，必取則於古。吉松潤甫校《歐蘇手簡》，又就予是正焉。予迨暇讀之，則當時狀態一公德音，如目觀之，如耳聆之，如身在其際，相與應酬。蓋二公文章滂沛輝煌，即片簡短札，自其三昧流出，妙用敘致，令人躍如，而其猥近細瑣，亦大文所未及，尤切事情，裨益學者不少。夫明文之鬱鬱，工尺二者亦多，務在菁華，動失核實。妝飾之辭溢，而宛轉之致乏，所不取也。今夫操觚之士，稍有達者，寥寥然曰『秦、漢』，曰『古文』，使其日用狀態，展楮寫之，則錯亂艱澀，率不能西而之華，尚何能遡而之古乎哉！秦、漢也，古文也，雖多，亦奚以為？皆以其不求於切近，故已，潤甫其有意於斯乎！舊本間有譌舛，今校照數本，又取本集監定之，潤甫之業勤矣。抑亦於操觚乎思過半矣。

安永庚子季冬，淡海竺常撰

〔1〕竺常之序於《新刻歐蘇手簡》、《正續歐蘇手簡》，皆為手書置於書首，序末有竺常印記兩枚。

歐蘇手簡序〔1〕

自科舉利祿之學興，則百藝具廢^[2]，此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夫文章翰墨，固士君子之餘事^[3]，如將之用兵，苟無旗幟鉦鼓，其何以駭觀聽哉！至於尺牘，藝之最末者也^[4]，古人雖三十字折簡^[5]，亦必起草，豈無旨哉！今觀新刊《歐蘇手簡》數百篇，反覆讀之，所謂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蓋無心於奇，而不能不為之奇也。近代楊誠齋、孫尚書啟札，其鋪張錯綜，非不縟撻，及溯流尋源，亦皆自二老理意中來^[6]。大抵意者文之帥，理者帥之佐，理意正則而辭從之牧之，所謂如魚隨龍，如鳥隨鳳，如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八表是也。予亦長怪乎，壬辰北渡以來，後生晚進，詩文往往皆有古意，何哉？以其無科舉故也。學者乘此間隙，何藝不可進，又豈止簡啟而已。恐國朝綿蕪之後^[7]，漢、唐取人之法立，則不暇及此，幸篤志焉。真止軒老人杜仁傑序。

〔1〕《箋注歐蘇手簡》、朝鮮本《歐蘇手柬抄選》、朝鮮本《歐蘇手簡》（版本不詳）未收此序。

〔2〕「廢」：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作「變」。

〔3〕「土」：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誤作「土」。

〔4〕「末」：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誤作「未」。

〔5〕「古」：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誤作「吉」。

〔6〕「中」：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誤作「申」。

〔7〕「恐」之後，朝鮮本《歐蘇手簡》（□□貳十六年癸酉六月版）於「國朝」句另頂格起行。

前言

(一) 關於杜仁傑

編選並成書於金元時代的《歐蘇手簡》，共分四卷，歐陽修、蘇東坡各二卷，前有杜仁傑序。正因為書前有杜仁傑寫的序言，故歷代圍繞杜仁傑產生了不少誤讀，為此有必要對杜仁傑作個簡單的介紹。

杜仁傑，原名之元，字仲梁，號善夫，又號止軒。濟南長清（今屬山東）人。元好問曾記：『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1]『金正大中，嘗偕麻革信之、張澄仲經隱內鄉山中，以詩篇倡和，名聲相埒。元至元中，屢徵不起。子元素仕元，任福建閩海道廉訪使。仁傑以子貴，贈翰林承旨資善大夫，謚文穆。仲梁性善謹，才宏學博，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平生與李獻能欽叔、冀禹錫京父二人最為友善，遺山元好問《送仲梁出山》詩有云「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其相契之深可知也。』^[2]兩段文獻中所說的「正大」，是為金哀宗年號（一二二四—一二三一）。杜仁傑的生平，元人蔣正子曾有記載：『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遊嚴相之門。嚴乃濟南望族，善甫為所敬重。一日讒者間之，情分浸乖。杜謝以詩云：「高臥東窗興已成，簾鉤無復掛冠聲。十年恩愛淪肌髓，只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其過，歛密如初。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燒銀燭照雲鬟，拂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快之，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予分教溧陽，一淮土過，求宿學舍。士遊山東甚久，為餘道其辭甚多，僅記此。』^[3]元人任士林也對杜仁傑事蹟有過記述：『往時，杜先生善甫，以道遊齊魯，客武惠公之門。時中原甫定，公方握重權為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磋磨琢之德，善謹不虧之道，衛人所以美武公者武惠公有焉。則先生善甫之行其道也，故東平稱杜氏，凡譜杜曲而繫東平者，皆名其胤壽康老人，則先生之胤而武惠公之老也。作堂於平陰之原，名曰「善善」，既而改曰「種德」。』^[4]從上引兩條

文獻中，我們既可以瞭解杜仁傑的性格，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杜氏乃由金入元時期的人。因為他曾與『嚴相』即為由金（南宋）入元時期的人。^[5]關於杜仁傑的生平，有學者作過相關的考證，如蔡美彪在《杜仁傑生平考略》一文中，依據元代石刻等文獻加以考證，得出以下結論：『杜仁傑約生於金泰和八年（一二〇八）前後，金正大四年（一二二七）進士及第。蒙古軍據山東，開封城危，去河南內鄉縣投依縣令元好問避亂。正大六年，元好問罷任，杜仁傑赴鄧州幕府。開興元年（一二三二）北渡黃河去山東東平，投依豪族嚴實，為嚴氏父子幕賓逾三十年。元世祖罷廢世侯，東平嚴氏撤藩。至元元年（一二六四）返回長清故里，為文壇巨擘。約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元朝徵召，表辭不赴。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本文依據元代石刻等文獻，考訂杜仁傑卒，年逾八十。』^[6]周郢在《新發現的元曲家杜仁傑史料》一文中，根據新出土的《杜忱墓誌》，作了以下考證：『《杜忱墓誌》撰刻於元定宗二年（一二四七）……據志石……杜仁傑原名之元，字善夫；後改名仁傑，更字仲梁。為杜忱之第三子。又志載仁傑之子四喜，或即杜質（元素）之幼名。……志石還為考察杜仁傑文學交遊提供了新線索。志石撰者康暉，字康之，高唐（今山東高唐）人。金末進士，元憲宗時，嚴實創東平府學，延為教授。終國子博士，卒贈翰林學士。有《澹軒文集》，已佚。康暉與仁傑並為嚴氏幕府中人，故應請為杜忱撰志。』^[7]當代學者的這些考證，也說明杜仁傑當為由金入元時期的人。

杜仁傑是金元時期有一定成就和影響的文學家，元好問曾以形象的語言這樣評價杜仁傑、張仲經、麻信之等人的詩：『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弟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8]他還說：『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巒波濤，穿穴儉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9]可知杜氏在金時詩名已著。當然，杜仁傑曾自認為自己的詩不如張仲經：『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也。』^[10]對於杜仁杰的文學成就，歷代都有較高

評價。如，元人王旭對杜仁傑曾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造化鍾秀江山，孕奇賢運五百，非公而誰？學際天人，聲名四馳；雄章俊語，星日爭輝；高文典冊，元氣淋灑；豁達飄逸，靈襟坦夷；鼓舞羣才，妙無端倪。動風雷於唇吻，溢陽春於鬚眉。斯文不墜，學者知歸，惟登夫岱宗之巔巔，而後知丘陵之為低；惟游夫滄海之汪洋，而後知坎井之為卑；惟觀夫神龍之變化，而後知蚯蚓之玄微。大鵬不可籠，天馬不可羈。偉先生之浩蕩兮，信餘子之難為；佩青霞而服明月兮，陋蟬冠與錦衣。」^[1]元人王惲亦言：「貧樂能安貴不淫，百年瘦海寄浮沉。閑中今古資談具，物外江山助醉吟。風義見來先急難，文章拈出更雄深。追攀逸駕嗟何及，時向逃空得苦心。」^[2]一代人文杜止軒，海翻鯨掣見詩仙。細吟風雅三千首，獨擅才名四十年。劍在不沉衝斗氣，神遊多了住山緣。老天未覺斯文喪，齊魯諸生有正傳。^[3]「泰岱東蟠未了青，文章公獨茲精英。賦方庾信才華壯，詩到樊川氣格清。平日酒杯追散聖，一生高節見陳情。風流想在齊梁席，未讓鄒枚獨擅名。」^[4]清人袁翼曾經寫了三十七首詩，以評論三十七位金人的詩歌創作，他對杜仁傑是這樣評贊的：「五律宗風淡不枯，襄陽摩詰賞音孤。滄桑幾箇完人在，白髮蕭蕭杜善夫。」^[5]杜仁傑不僅在詩詞文創作中有一定的成就，而且在散曲創作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樹。元人楊朝英在《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九「小令」中，曾收入了杜仁傑套曲「般涉調·要孩兒」《莊稼不識勾欄》和「般涉調·要孩兒」《喻情》，在同書卷三中又選入其【雙調·得勝令】《美色》。明人程明善在《嘯餘譜·北曲譜》卷八「雙調」中，則將杜仁傑「般涉調·要孩兒」《喻情》中的【金娥神曲】（「世俗，看取，花樣巧番機杼。乾坤腐儒，天地逆旅，自歎難合時務！」）單獨選出。雖然杜氏散曲存世作品不多，但這些以善謔和風趣為特色的作品，却是研究元代散曲極有價值的重要資料。

關於杜仁傑究竟是什麼朝代的人，一般認為或金或元，但歷史上也曾有過這樣一種說法，認為他是南宋人。如，元人陳世隆在《宋詩拾遺》卷二十一中，就將其《有嘗兵官遠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感賦》選入^[15]。清人陸心源則說：「杜善甫，南宋初濟南名士。」^[16]清人王士禎也曾這樣說：「宋有杜善甫者，濟南名士，善為詩。」^[17]關於「南宋說」似難成立，因為杜仁傑與元好問為同時代人，而且與杜氏交往的人也多為金元時期的人，這當是不爭之事實。上文所引文獻也足以證明這一點，為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徵引其他文獻加以闡述。如，元好問與杜仁傑是朋友，兩人過從甚密，元好問曾明確記述：「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18]元氏與杜氏也多有

詩文酬答，元好問就有《半山亭招仲梁飲》、《杜善甫乞炭》、《和仲梁》、《與張杜飲》等詩作。杜仁傑也有《遺山先生文集後序》等。另，元人房祺也有與杜仁傑交遊詩，如《送杜仲梁東遊》、《寄杜仲梁》等；《元史·劉敏中傳》也載：「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19]元人虞集也曾有這樣的記述：「女真人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跡，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於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謠……」^[20]另，從杜氏自己的文章中也可以證明他確是由金入元時期的人。如：杜仁傑曾寫過一篇題為《真靜崔先生傳》的文章，文章這樣寫道：「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輦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履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21]文中「貞祐之亂」，寫的是金貞祐年間（一二一三—一二一七年）發生在山東地區的混亂局面；而「興定辛巳」，指的是金興定五年（一二二一年）。杜仁傑在文章中所用年號均爲金代年號。又如，杜仁傑在《東平張宣慰登泰山碑》一文中，他這樣寫道：「皇帝中統元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異政，考爲天下最字，上親召勞以卮酒，至以字呼，朝野榮之。越四年，上復命公爲東平宣慰使，嘗曰：曲阜寔夫子之庭，泰山爲中原神嶽，皆在鏡下，所當親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辦嚴……」^[22]文中所稱「中統元載」、「至元」均爲元世祖忽必烈的年號，而文中所稱「皇帝」，當指元世祖忽必烈無疑。此亦證明，杜仁傑撰文時已然入元。以上諸多文獻都顯示，杜仁傑當爲金元時期人。^[23]然而，直到現在，仍有將杜仁傑誤稱爲宋人的，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在介紹《歐蘇手簡》時稱爲宋杜仁傑編選；《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也稱：「《歐蘇手簡》四卷二冊，宋杜仁傑編，日本天明元年刊本。」張智華在《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一書中說：「《歐蘇手簡》四卷，杜仁傑編。今存日本天明元年刊本，藏於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此本有宋杜仁傑序，序中有「近代楊成齋、孫尚書啟劄」，可見杜仁傑爲南宋人。」^[24]由此可見，《南宋說》謬誤之深遠。

如果說將杜仁傑認定是宋人，這是從歷史延續到今天的『誤會』，那麼，將《歐蘇手簡》的編選者認定為杜仁傑，則就是今人的錯誤了。除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張智華《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等犯了這個錯誤外，還有一位學者也同樣犯了這個錯誤，這位學者就是祝尚書先生，他在《〈歐蘇手簡〉考》開篇即說：『《歐蘇手簡》四卷，杜仁傑編。』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更是以『《歐蘇手簡》編者杜仁傑考』為題^[25]，可見祝尚書先生對《歐蘇手簡》編選者為杜仁傑是深信不疑的。而祝尚書先生的這一觀點，在學界也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不少人以此為據，認為《歐蘇手簡》的編選者就是杜仁傑，如，周郢在《新發現的元曲家杜仁傑史料》一文中就稱：『祝尚書先生《歐蘇手簡考略》，又公佈了一部新發現的杜氏佚書——《歐蘇手簡》。』^[26]王永在《論元代文壇對歐陽修古文風格的接受》一文中也說：『元代杜仁傑選編《歐蘇手簡》則以專錄書劄為特色，收歐公書信一百二十三篇。』^[27]……大家之所以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因為《歐蘇手簡》前有杜仁傑撰寫的序言。為此有學者對這個錯誤作了糾正，朱剛就在《關於〈歐蘇手簡〉所收歐陽修尺牘》一文中明確指出：『祝尚書先生把《歐蘇手簡》序言的作者杜仁傑認作此書的編者，我以為不夠妥當。杜氏只寫了序言，序中並未交待他自己是編者，那真正的編者，應該生活在周必大編定本歐集流行之前，或者難以獲得周氏編定本的地區（如宋金對峙時期的北方），因為周必大的本子行世後，幾乎將從前的歐集諸本都淘汰了，很難想像周必大以後的南宋人或南北統一後的元朝人會從吉、綿本去選錄歐公的尺牘。』^[28]的確，僅從杜仁傑的序言中，我們是無法得出《歐蘇手簡》的編選者究竟是誰，更無法判斷此書的編選者就是杜仁傑。依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資料，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就是《歐蘇手簡》的編選者為佚名。^[29]

(二) 關於《歐蘇手簡》

〔1〕現存最早的《歐蘇手簡》

編選於金元時代的《歐蘇手簡》，其刻印情況究竟如何？關於這一點，學界似乎也不甚明瞭。大家普遍認為，此書在國內已經失傳，而在日本、朝鮮則有翻刻，且至今流傳。如祝尚書先生在《〈歐蘇手簡〉考》一文中就說：『《歐蘇手簡》四卷，國內（包括臺灣）久已失傳，今存兩個版本，皆由鄰邦重刻，即日本天明本、朝鮮宣祖朝本。』^[30]朱剛先生在《關於

〈歐蘇手簡〉所收歐陽修尺牘》一文中也認為：『《歐蘇手簡》四卷，包括了歐陽修和蘇軾的尺牘各二卷，書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傑所作的序。此書國內不傳，而在韓國、日本則有刊本多種。』^[3]依祝、朱兩位先生所言，《歐蘇手簡》在國內已無流傳。其實不然，《歐蘇手簡》在國內仍有存本。

近讀黃裳先生幾篇文章，得知《歐蘇手簡》在國內仍有明初刻本存世。現將黃裳先生關於《歐蘇手簡》的幾篇文章摘錄如下：

此黑口本歐蘇手簡，辛卯初春，得於楊賈之書包中，亦鄭西諦、張蕙玉家所出者，意甚愛之，以其有東坡居士小劄也。諸家目俱未見，未能定其刻於何時。余舊藏成化本中州啟劄，亦黑口。其後序為成化二年莆田翁世資撰，略云，同寅右參議方公藏有善本，用是重繡諸梓，以附歐蘇尺牘之後。因知此本殆亦翁氏刻，而時日較先，當在天順之末。明初黑口本久為世所珍重，估人往往撤去舊序，以充元刻，此種伎倆，所見多矣。真大殺風景事，是書林一劫，在水火兵蟲之外者。此冊前有錫山鄒氏焦綠草堂藏印，向亦不知其人本末。後收乾隆刻大雅堂文集，得見補山傳，為之大快。匆匆未暇跋之，而原書高閣密鎖，一時無從得見，當俟異日詳之。辛亥十月十二日重跋，此本來歸恰二十年矣。

大雅堂初稿詩六卷文八卷，勾吳鄒方鐸撰，乾隆刻。有焦綠草堂記云，族叔曉庭構書屋於其居之西偏，顏其楹曰焦綠草堂。草堂三楹，南向，其右側屋三楹，庋書萬卷，別顏曰曉庭。主人因以為號云。辛亥十年十二日午後，檢書得之，更記。辛卯春二月初十日海上所收。黃裳藏書。

歐蘇手簡四卷，前二卷題下署廬陵先生，後二卷題東坡先生。明初刻。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欄。前有真止軒老人杜仁傑序。序有言，『予今長怪乎壬辰北渡以來，後生晚進，詩文往往皆有古意。何哉？以其無科舉故也。』可徵書成時日。收藏有『錫山焦綠草堂鄒氏書畫記』（朱方）、『鄒儀、曉庭』（白朱文聯珠印）、『補山一字曉庭』（朱方）、『九峰舊廬珍藏書畫之記』（朱文長印）。前二卷歐文，題『廬陵先生』，三四兩卷蘇文，題『東坡先生』。此本及《中州啟劄》皆元人

書（按，即《歐蘇手簡》）凡四卷，明初刻，十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四周雙邊。前有真止軒老人杜仁傑序。收藏有『鄒儀』、『曉庭』（白朱文聯珠印），『補山一字曉庭』（朱文方印），『錫山焦綠草堂鄒氏書畫記』（朱文方印），『九峰舊廬珍藏書畫之記』（朱文長印）。前二卷歐文，題『廬陵先生』，三四兩卷蘇文，題『東坡先生』。此本及《中州啟劄》皆元人

^[32]

手輯刊行，而明初翻刻者。疑書尾當有刊書跋語，已為書估抽去，以充元版。刻法樸茂，信是初明開版。杜序云，「自科舉利祿之學興，則百藝俱廢」，慨乎言之，開卷即斥科舉之病，可謂先覺。又稱歐蘇數百篇書簡，「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近代楊誠齋，孫尚書啟劄，其鋪張錯綜，非不褥撲，及沂流尋源，亦皆自二老理意中來」，言外微意，於孫楊不善也。可謂知言。序末慨言：「予今長怪乎壬辰北渡以來，後生晚進，詩文往往皆有古意。何哉？以其無科舉故也。」胡元一代，蔑視讀書士流，列之於九流之末，人皆痛之，老人特借重刊故宋大家文字，一傾憤懣。此序非通常應酬之作，有真感情，有真見識，未可輕易讀過。

無錫焦綠草堂鄒氏，為江南小藏書家，頗以不知其人為憾。會偶買得乾隆刻《大雅堂初稿》十四卷，勾吳鄒方鍔撰。中有《焦綠草堂記》，知為族叔曉庭所構藏書之所，為之一快，輒附記於此。^[33]

此明初黑口本，凡四卷。前二卷題《廬陵先生》，皆歐陽永叔作；後二卷題《東坡先生》，則蘇子瞻作也。以年輩先後次第如此。永叔諸劄皆以「某啟」二字冠全篇，其《與梅聖俞》略云：「承惠答蘇軾書，甚佳。……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可見歐陽行輩之尊，愛才之篤。然以賦《臨江仙》之詞人，卻不能放筆作小劄，則與東坡小異。此書所收諸劄，漫無次序，作於不同時地之箋劄，雜編成卷。東坡諸劄，頗多作於放廢遷謫之中，感懷身世，多至情流露處。卷四《與友人》一劄云：「困蹠之甚，出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耳。雖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付，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複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蘇軾的創作成果是多方面的。在宋代，大抵着重刻行了他的詩文集，他的《樂府》，到元代始有專刻，即南阜書堂本《東坡樂府》。至於他的箋劄，更得人們賞識，可惜不能入文集，早在元代已有《東坡先生翰墨尺牘》八卷之刻，鐵琴銅劍樓曾有之。到明代晚期，什麼《蘇長公二妙集》（尺牘、詩餘）；《蘇長公小品》等刊行不絕。蘇軾的《大全集》，包括詩文詞簡尺在內的所有創作，是明成化程宗刻行的。這裏介紹的《歐蘇手簡》四卷，據我考定，當是天順前後刻成，與少後刻於成化二年之《中州啟劄》同為翁氏所刻。^[34]

黃文雖然多有重複，但是，他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歐蘇手簡》至今仍有明初刻本存世。遺憾的是，這個也許是海